

SJDPXSMZJX

世界短篇小说名著精选

sjdpxsmzjx



中国出版社

世界短篇小说名著精选

第二卷

长春出版社

目 录

外套	〔俄〕果戈里 1
狂人日记	〔俄〕果戈里 31
黑猫	〔美〕爱伦·坡 55
鄂榭府崩溃记	〔美〕爱伦·坡 65
信号员	〔英〕狄更斯 85
穷人的专利	〔英〕狄更斯 100
塔 堡	〔俄〕莱蒙托夫 107
茵梦湖	〔德〕史托姆 121
白净草原	〔俄〕屠格涅夫 153
木 木	〔俄〕屠格涅夫 176
白 夜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210

一颗简单的心	[法]福楼拜	269
舞会以后	[俄]列夫·托尔斯泰	302
竞选州长	[美]马克·吐温	315
一百万镑的钞票	[美]马克·吐温	322
咆哮营的幸运儿	[美]哈特	347
柏林之围	[法]都德	361
最后一课	[法]都德	371
磨坊之役	[法]左拉	377

外 套

[俄]果戈里

陈恩冬 译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1809~1852)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生于乌克兰一个中等地主家庭。1828年中学毕业后,在12月党人运动影响下,抱着“为人类服务”的美好愿望到了彼得堡,1829年当上一个小官吏,薪俸微薄,生活艰苦。1831年初,他辞去职务,专门从事写作。1831~1842年间,是果戈里创作旺盛时期,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集》(1835),喜剧《钦差大臣》(1836),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1835~1842)等。《钦差大臣》以辛辣的讽刺揭露了一伙在农奴制俄国孽生的披着官吏外衣的骗子、盗窃犯和贪污犯。《死魂灵》借一个诡计多端的投机家为收买死去了的农奴的灵魂遍访贵族庄园,展示了俄国外省地主形象的画廊,深刻地描绘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停滞落后的社会生活。

1836~1848年间,果戈里基本上在罗马和德、法等国度过,

到1848年才真正回到俄国。长期的国外侨居生活,脱离了祖国进步文学界的影响,加之处于反动文人的包围之中,对他的后期思想和创作产生过不良影响。

《外套》和《狂人日记》是《彼得堡故事集》中的两篇优秀之作,写的都是在沙皇俄国被蹂躏的“小人物”的凄凉命运。作者对他们深怀同情,但却把他们写成给社会压毁了、逆来顺受的可怜虫。这正显示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外套》的笔墨很经济,仅围绕一件外套来刻划被剥夺了一切生活乐趣、得不到任何注意和保护的小官吏的性格,并通过他来揭露冷酷无情的贵族官僚社会。作者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幽默笔触,包含着对主人公的“含泪的笑”。《狂人日记》巧妙的构思展示了作者的艺术匠心。狂人的日记,狗的通信,都是些荒诞不经的奇谈,而表现的却是真正现实的世界。狂人的心理变化合乎生活逻辑。“世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全都被侍从官啊,将军啊占去了”——这是当时贵族官僚社会的实质,是使“小人物”备受折磨乃至发疯的罪恶之源。(胡湛珍)

在司里……但最好还是不要说出哪一个司。再没有什么比各种各样的司、团、办事处,一句话,再没有什么比各种各样的公职人员更会发脾气的了。现在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受辱就是整个社会受辱。听说,不久之前,一个县警察局长递交了一纸呈文,我不记得是哪个县城的,他在呈文中详细地说明,国家的法制正濒于毁灭,它的神圣的名字正任意被人亵渎。为了证明这点,他在呈文后面还附了厚厚一卷风流小说,那里每隔十页就提到一次警察局长,有好几处都把他写他喝得烂醉如泥。因此,为了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们最好还是把这里要讲到的司叫做某一个司吧。于是,在某一个司有某一个官员供过职;这个官员不能说是一个才貌出众的人物,而是矮矮的个子,脸上有几颗

麻子，头发有点发红，看上去甚至眼睛也有一点近视，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颊布满了皱纹，而灰黄的脸色，叫人怀疑他患有痔疮……有什么法子呢！这应该归罪于彼得堡的气候。至于说到官衔（因为在我们这里必须首先报出官衔），他是个所谓的终身九品文官。众所周知，各种各样的作家都要将这种人拿来任意取笑和奚落。那些作家的一种值得称颂的癖好，就是欺侮那些不会咬人的人。这个官员姓巴什马奇金。只须看看这几个字，就知道此姓本是从鞋子^①变来的；但是在什么年份，什么时候，怎么会从鞋子变来的，就不得而知了。父亲、爷爷、甚至妻舅，以及所有的巴什马奇金家的人都穿靴子，每年约摸只换两至三回鞋掌。他的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但是，我可以担保，决不是这样找来的，而是自然而然走到这一步，无论如何不能给他取别的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在子夜出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一天是3月23日。现已亡故的母亲，是一个官员的老婆，一个贤惠的女人，她已经为儿子受洗做好了一切准备。母亲躺在门对面的床上，右首站着教父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什金，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曾在枢密院里当股长；还有教母阿丽娜·谢苗诺芙娜·各勃柳什科娃，她是巡长的老婆，一个具有超人美德的女人。他们给产妇三个名字，任她挑选：莫基亚、索西亚，或者给孩子一个殉教者的名字：霍兹达扎特。“不行，”母亲想，“全是这些老一套的名字。”为了讨她喜欢，大家把日历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又跳出了三个名字：特里费利、杜拉、瓦拉哈西。“这真是报应啊，”老太婆说，“全是些什么样的名字！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名字。要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倒也说得过去，可偏偏是什么特里费利，什么瓦拉哈西。”大家又翻过一页，又出来了巴甫西卡希和瓦赫基西。“得

① 在俄国，有一种鞋子叫（巴会马克）。

了，我明白了，”老太婆说。“看来他命该如此，既然这样，就让他叫父亲的名字好了。你父亲叫阿卡基，那么儿子也就叫阿卡基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这样问世了。孩子受了洗礼，这时他哭了，并且做了个鬼脸，似乎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是一个九品文官。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们这样交待，是要使读者了解，这一切都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毫无办法给他起一个旁的什么名字。他是哪年哪月到司里任职的，是谁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的，这一点谁都记不起来了。不管换了多少司长和各式各样的上级，我们总看到他坐在同一个地方，摆着同一个姿势，干着同一个差使，始终是一名文抄官。因而，以后大家都以为，他定是一出世就是现在的模样儿，身穿制服，头上秃顶。在司里没有人对他表示尊敬。当他进门的时候，门警非但不站起来，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只当是一只小小的苍蝇飞过接待室；长官们对他既冷淡，又专横。有一个副股长经常把一叠公文朝他鼻子底下塞，也不说一声：“请您抄写一遍。”或者，“这一份卷宗倒是很有意思的。”或者说一两句文明官场中悦耳动听的俗套话。而他接了过来，眼睛只盯住公文，也不看一看递给他公文的是谁，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个权力。他接过公文，就马上动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把一切流行在办事机关中的俏皮话都拿出来嘲笑他，挖苦他。他们当着他的面讲述关于他，关于他的女房东，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的种种编造出来的故事，说这个女房东经常打他；他们还问他和女房东什么时候举行婚礼；他们还把碎纸撒在他的头上，说是下雪了。但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们，似乎在他面前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这甚至并不影响他的工作：不管别人如何纠缠不清，他却没有抄错一个字。只有当玩笑开得实在叫人无法忍受，人家碰他的胳膊，使他无法进行工作时，他才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为什么你们要欺侮我呢？”在这一句话里和说这句话的声音里，包含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从这句话里可以

听到一种乞求和怜悯，以致一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想学别人的样子，也来取笑他，现在突然像被刺痛似的呆住了；从此以后，在他的眼前仿佛一切都变了，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他同已经相识的同事们疏远开来，他以前一直把这些人当成体面的上流人物。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最愉快的时刻，在他的脑海里总会映现出一个脑门上秃了一块、个子矮小的官员，以及他那句使人心痛的话：“让我安静一下吧！为什么你们要欺侮我呢？”在这句使人心痛的话语里还听到另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用一只手掩住自己的脸；以后，在他的一生中，当他看到一个人身上有那么多残酷无情的东西，在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士绅中间，天啊，甚至在被公认是品德高尚、心地正直的人中间，隐藏着那么多残忍粗野的东西的时候，他总是感到毛骨悚然。

很难找到这样忠于职守的人了。如果只说他办事热心，还嫌太轻了点，他酷爱自己的工作。在那里，就是在抄写工作中，他仿佛看到一个变幻莫测，赏心悦目的世界。在他的脸上时常流露出喜悦；有几个字母成了他的宠儿，只要他写到这几个字母，就会得意忘形；又是暗暗发笑，又是挤眉弄眼，又是歪歪嘴皮，好像从他的脸上可以读出他笔下写出的每一个字母。如果按照他对工作的热心程度给他奖赏的话，也许他会大吃一惊，他甚至可以捞到一个五品文官的衔头；但正像他那些善于挖苦人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只捞到纽扣上挂个皮带扣，屁股上生个痔疮。当然也不能说，别人从来没有注意过他。有一个司长，是个好人，想对他的多年工作给予奖励，于是吩咐给他一个比普通的抄写略为重要一些的差使，就是要他把一件现成的公事，草拟一封公函给别的办事机关；要做的事情也不过是换一换公函的台头，再将几个动词从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可是干这个差使却累得他满头大汗，老是擦额上的汗水，他终于说：“干不了啦，还是给我一点

什么东西抄写抄写吧。”从此以后，别人也就一直让他干抄写的活了，除了抄写，对他说来好像什么东西也不存在。他根本不注意自己的衣着：他身上的制服颜色已不是绿的了，而变得红褐带灰。制服的领子又窄又矮，因此尽管他的头颈不长，可伸在领子外面似乎显得特别细长，好像在俄国的外国小贩每十来个一盘顶在头上的摇头晃脑的石膏小猫的颈脖。并且，在他的制服上总粘带着什么东西，不是些碎稻草，就是一段线头。而且他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每次上街，走过窗口的时候，总赶上人家扔出各种各样的脏东西，弄得他的帽子上老是挂着西瓜皮、香瓜皮，以及诸如此类的垃圾。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注意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不去注意他的年轻的同事经常留意的事情。众所周知，那些年轻官员的骨碌碌的眼睛，其敏锐性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他们可以看得见对面人行道上某一个人裤脚口上的套带崩落下来——这种事总是引得他们狡黠地发笑。

如果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看到了什么的话，那末他看到的就是自己用清晰工整的笔迹写出的一行行字；只有当突如其来的一匹马，将头搁到他的肩膀上，鼻孔里喷出一阵风吹到他面颊上的时候，他才注意到自己不在字里行间，而是走在马路当中。他一回到家里，就立刻往桌子边一坐，急急忙忙地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白菜汤，吞下一块洋葱牛肉，也从来不去辨别什么味道，连苍蝇以及此时此刻上帝赐予他的一切东西都囫圇吞枣送进肚里。肚子觉得发胀了，他就站起身来，拿出墨水瓶，抄写带到家里来的公文。如果碰上没有这种事可做，他就出于个人的乐趣，有意给自己抄一个副本，特别是如果公文之妙不仅在于文体优美，而且还在于是写给某个新上任的或者某个显要人物的话。

甚至在那种时刻，当彼得堡的灰白的天空完全暗下来，全体官员按照各人的官俸和癖好吃饱喝足的时候，——当司里的笔尖的沙沙声已经止息，各种的忙碌已经停止，自己和别人的必须

办的事情已经办好，好管闲事的人把不必要揽在自己身上的事办完以后，大家都去休息的时候，——当官员们忙于把多余的时间用于享乐的时候，有的劲头比较大的，就上戏院；有的去逛马路，把时间消磨在品赏哪个女人模样长得漂亮；有的去赶晚会，一味恭维某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姑娘，小小官场中的明星；最为常见的是，有的人干脆到同事家里去，他们住在四层或者三层楼，两间不大的房间，带有一间前屋或者厨房和房间里摆设一些时髦的小玩意儿，如灯啊，或者用省吃俭用等大量低价换来的小东西，——总之，当所有的官员都分散在自己朋友家的小房间里玩惠斯特牌，一边喝茶，一边啃用几戈比买的面包干，从长烟斗里吞云吐雾，在发牌时讲述一些从每个俄国人无时无刻不得不追求的上流社会中传出来的流言蜚语，或者甚至当无话可说只能重复那个关于一个司令官的说不完的奇闻——据说有人向他报告，法尔孔纳塑造的纪念碑^①上的马尾巴被砍掉了的时候，总之，当大家都去尽情消遣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不醉心于任何的娱乐。谁也不能说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晚会上看到过他。他抄写够了，就躺下睡觉，一想到明天的日子，脸上就自然地露出了笑容：明天上帝一定又要让他抄写什么东西了。一个以挣四百卢布薪俸而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感到心满意足的人的平静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也许，这样的生活会一直继续到他的暮年，如果不仅在九品文官，而且在三品、四品、七品以及一切文官的生活道路上，甚至在那些不给任何人出主意，也不接受任何人主意的文官们的生活道路上不布满五花八门的灾难的话。

在彼得堡，每个一年挣四百卢布左右薪俸的人有一个大敌。这个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北方的严寒；虽然，据说这种严寒

^① 指 18 世纪法国著名雕塑家法尔孔纳创作的彼得大帝纪念碑。

有益于健康。每天早晨，一过八点，也就是正当街上到处都是到司里去上班的人的时候，寒风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像一根根锋利的刺儿扎向每个人的鼻子，那些穷官员们简直不知道把鼻子往哪儿藏。连身居高位的大官都被冻得脑门发痛，眼泪汪汪的时候，可怜的九品文官们经常是束手待毙的。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裹着单薄的外套，尽快地穿过五六条街，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脚，一直跺到把路上冻僵了的执行职务的能力和才干恢复为止。近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开始感到他的脊梁和肩膀冻得够呛，尽管他以最快的速度使劲地跑完应该走的一段路。他终于省悟，毛病是不是出在他的外套上。回到家里，他把外套从头到尾仔细地查看一遍，发现有两三个地方，正是在背脊和两只肩膀上，面子已经成了稀麻布了：呢子磨穿了孔，里子也破得稀稀拉拉。这里需要交待几句，就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是官员们取笑的对象，外套这个高贵的名字甚至也被剥夺了，而管它叫长袍。事实也是这样，他的这件外套的确与众不同：领子一年比一年缩小，因为把它剪下来去补别的地方了，而且补得又笨，又难看，丝毫也看不出什么裁缝的手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到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决定需要把这件外套拿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儿去，这个裁缝住在某处从后楼梯上下的四层楼上。他虽然只有一只眼睛，又生了满脸麻子，可是缝补官员们和其他人的裤子和燕尾服却是很出色的；自然喽，只是在他没有喝醉，脑子里没有胡思乱想的时候，才做得出好生活。关于这个裁缝，当然不必多费口舌，但是现在有一种习惯，就是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得交待清楚，所以毫无办法，也只得在这儿把有关彼得罗维奇的事情交待一番。他本名叫格里高利，是某一位老爷的农奴。后来他领到了释奴证，于是每逢节日，起初是每逢大节日，后来就不管大小，只要日历上有画着十字的宗教节日，都狂饮一顿。自此之后，人家就管他叫彼得罗维奇了。在这一方面他是忠

于祖先的习惯的：他跟老婆吵嘴的时候，就骂她是臭婆娘和德国婆。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他的老婆，那对她也得说上两句，但是很遗憾，有关她的事情我们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一个老婆，戴的还是一顶包发帽，而不是扎的头巾；说到长相，似乎无法夸口；只有那些近卫军士兵碰到她的时候，才对这个戴着包发帽的女人膘上一眼，翘翘胡子，发出一声怪叫。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爬上通向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说句公道话，楼梯上沾满了污水和泔脚，浸透着熏灼眼睛和酒精气味，凡是彼得堡房子的后楼梯上都散发着这种气味的。当他爬上通向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时，就在盘算，彼得罗维奇会开口要多大价钱，他暗中打定主意给的钱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卢布。门开着，因为女主人正在煎一条什么鱼，熏得厨房里烟雾腾腾，连蟑螂爬过都看不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连女主人都没注意到。他终于走进了房间，只见彼得罗维奇，像个土耳其总督一样，盘腿坐在一张没有漆过的大木桌旁边；他按照做裁缝的习惯，在坐着干活的时候，赤着两只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早已看惯的大拇指，油灰指甲长得像乌龟壳一样，又厚又硬。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挂着一绞丝线和纱线，两只膝盖上铺着一块破布。他已经穿了三分钟的针眼，还没有穿进，所以他对房间里这么暗十分生气，甚至对这根线也十分生气。他低声咕噜着：“穿不进，野婆娘，害得我好苦啊，你这个死鬼。”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见此情就很不高兴，他不该在彼得罗维奇生气的时候到这儿来。他喜欢在彼得罗维奇略带醉意，或者像他老婆所说的“这个独眼鬼，给白干灌饱了”的时候来找他做点活儿。在这种时候，彼得罗维奇总是肯让点价钱，并且一口答应下来，甚至还鞠躬道谢。后来，当然喽，又是他的老婆哭哭啼啼地跑来说，他男人喝醉了，所以价钱要低了；这样加给她十个戈比，事情也就妥了。而现在，彼得罗维奇似乎正是清醒的时

候，所以脾气特别倔，不容易说话，鬼知道他会怎样漫天要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料到这一点，因此像俗话所说的，想打回票了。但为时已晚，彼得罗维奇眯起独眼，直盯住他瞧。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得开口说：“你好，彼得罗维奇！”“祝您好，老爷！”彼得罗维奇说着，使用自己的一只独眼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双手瞟一下，想看看他带来了什么可捞的油水。

“我上你这儿来，彼得罗维奇，是那个……”读者务请注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明一件事情总要使用大量的前置词、副词，最后还有一些不表达任何意义的小品词。如果碰到要办的事情很不顺利，他干脆就话不成句，所以他经常用这几个字开头：“这，说实在的，完全是这么……”接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连他自己也忘得一干二净，以为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什么事啊？”彼得罗维奇一面说着，一面用自己的独眼把他的制服仔细地打量一番，从领子一直看到袖口、后身、下摆和扣眼，这一切都是他十分熟悉的，因为这全是他亲手做的。见面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每个做裁缝的习惯。

“我那个，彼得罗维奇……一件外套，呢子……你看，别的地方都很结实，上面沾了点灰，所以看上去好像旧的，其实还是新的，就是有一个地方有点那个……在背脊上，还有在一只肩膀上稍许磨破了点，就是在这只肩膀上有一点，你看，就这么一点，费不了多少人工……”

彼得罗维奇接过长袍，先把它摊在桌上，仔仔细细地看了好久，摇摇头，然后把手伸到窗台上去拿一只圆形的鼻烟盒，上面画着一个将军，可不知道是谁，因为这个将军的脸孔被手指捅了个窟窿，后来在上面贴了一张四方的小纸片。彼得罗维奇吸了吸鼻烟，用双手将外套张开，对着光线仔细地看了一下，又摇了摇头。他又把贴着小纸片的画着将军的盒盖打开，拿了点鼻烟塞在鼻孔里，把盖盖上，把鼻烟盒放好，然后开口说道：

“不行，不能补了，全烂透了！”

一听此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噗通一跳。“为什么不能补，彼得罗维奇？”他简直是在用小孩子的哀求语调说话，“一共不过肩膀上磨破了些，你不是有一些零碎料子……”

“碎料子可以找一找，也能找到，”彼得罗维奇说，“可缝不上啊，衣服都烂了，针一碰，就脱线了。”

“脱就脱吧，你就再给补上一块。”

“往哪儿打补丁？补上去不顶用，破得太厉害了。说好听一点，是呢子，可是风一吹，全碎了。”

“还是给补一下吧！怎么说呢，实在那个……”

“不行，”彼得罗维奇坚决地说，“一点办法也没有。实在破得不行了。您还是到冬天天冷的时候，把它撕下来做包脚布吧，因为长统袜不保暖。这袜子是德国人想出来的，为的是能多赚钱（彼得罗维奇一有机会就喜欢刺德国人一下），可是外套，您一定得做件新的。”

一听到“新”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顿时两眼发昏，屋里的东西都在他眼前打转。他看得清楚的只有彼得罗维奇的那只鼻烟盒盖子上脸上贴着小纸片的将军。“什么，做新的？”他说，看他的神情好像依旧在梦中似的，“可我没有这笔钱。”

“对，做新的。”彼得罗维奇用冷酷的，无动于衷的语调说。

“那末，如果一定要做新的，那……这个……”

“您是说，要花多少钱？”

“是的。”

“您得至少花上一百五十卢布。”彼得罗维奇说，并且意味深长地抿了抿嘴唇。他非常喜欢追求强烈的效果，喜欢突然难倒对方，然后斜瞅着被难住的人听了他的话以后，脸上会做出怎样的怪相。

“一百五十卢布一件外套！”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

喊了起来，也许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喊，因为他一直以低声说话著称的。

“是的，”彼得罗维奇说，“还得看什么样的外套。如果领子是貂皮的，风帽用绸里子，那得花二百卢布。”

“彼得罗维奇，劳你的驾。”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用恳求的声调说道。他没有听，也不想去听彼得罗维奇的那些话以及它产生的一切效果。“随便怎样补一下吧，能凑合用就行了。”

“不行，结果准是工夫白费，钱也白白糟蹋了。”彼得罗维奇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他讲完之后，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彼得罗维奇在他走后，仍然久久地站着，意味深长地抿住嘴唇，没有坐下来干活；他很满意没有毁了自己的声誉，也没有糟蹋裁缝的手艺。

走到街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恍恍惚惚，如在梦中。“事情竟弄成这个样子，”他自言自语地说，“说实在的，我万万没料到事情会办成那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是这么回事啊！事情竟弄成这么个结果，我，说实在的，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又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啊，这么回事！简直太突然了，万万没有……会有这种局面！”讲完这句话，他没有往家里走，而不知不觉地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路上一个满身灰的扫烟囱的人撞了他一下，弄得他一肩膀都黑了；一大把石灰从一幢正在建造的房子顶上跌落下来，撒了他一身。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后来，一直到撞上了一名岗警的时候，才稍微清醒一点，那个岗警正把长柄斧搁在身旁，从一只角形烟盒往长满老茧的手心上倒鼻烟。岗警冲着他喝了一声：“走路怎么往别人脸上撞，你干吗放着人行道不走！”这才使他往四周看了看，转身走回家去。回家以后，他开始定下神来，清楚而真实地看到自己的处境，开始不是语无伦次而是理智地、坦率地同自己交谈，就像同一个能倾吐自己私房话的通情达理的朋友交谈一样。“不

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现在不能去同彼得罗维奇讨价还价：他现在那个……老婆，大概又打他了。我还是星期天早上去：他星期六睡了一晚以后，眼睛准是斜着瞅人，睡过了头，他就得再喝点酒醒醒脑子，而老婆不给他钱，这时我只要那个，把十戈比塞到他手里，他就会变得很好说话了，外套到时也就那个……”就这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暗自盘算着，振作起自己的精神，一直等到了下一个星期天。这一天，他远远看见彼得罗维奇的老婆出门上街去了，于是他就径直去找彼得罗维奇。彼得罗维奇果然在星期六以后一只独眼斜视得厉害，耷拉着脑袋瓜子，完全是一副睡过头的样子，但是当他知道了对方的来意后，就好像有一个魔鬼推了他一下似的。“不行，”他说，“请您定做新的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立即朝他手里塞了十个戈比，“谢谢您，老爷，为您的健康干几杯，”彼得罗维奇说，“外套的事您就别再操心了吧，这件实在一点也不顶用了。我一定给您加工缝制一件新的，包您满意。”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还想唠叨修补的事情，可是彼得罗维奇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我一定给您做一件新的，这件事交给我好了，我一定尽力而为，式样甚至可以做得最时髦，领钩用镀银的。”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才看到新外套非做不可，于是就完全灰心了。真的，可怎么办呢，指望什么，用什么钱去做新的呢？当然，一部分也许他能指望将来的节日赏金，但是这笔钱早就预先支配停当了：要做一条新的裤子，要还给鞋匠换新靴面的旧帐，还得向女裁缝定做三件衬衣和两件不须用文字表达的内衣，一句话，所有的钱都得花个精光；即使司长大发慈悲，给他的不是四十卢布赏金，而是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剩下的钱也是可怜得很，用来做外套还是杯水车薪。当然，他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个怪脾气，就是喜欢漫天要价，有时甚至他的老婆也忍不住叫起